

日本政界二十年

近衛子記



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

高天原 譯
孫識齊

日本近衛文麿著

年十二界政本日

——「記手衛近」——

著 詹 文 衛 近

譯 原 天 高
齊 識 孫

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

年十二界政本日

——「近衛手記」——

(全一冊)

(版權
所有)

著者 近衛文麿

譯者 高天原 孫識齊

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
北平西單北大街一一三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

戰前被譏爲懦弱者，戰時被罵爲和平運動家，戰後被視爲戰犯，余殆受命運之支配！

——摘譯自「近衛日記」——

譯 序

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，在日本將近投降之時，根據自己的日記，寫出日本戰時在政治上形成重要關鍵的幾次政變與國際事件的經緯。不過，幾篇記錄的寫作時間，亦各有不同，例如本書中的第五篇「關於日美和平談判」一文，是在太平洋戰爭勃發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，即已開始，而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大體已經寫完。其餘的幾篇，是在停戰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，把過去已寫成的部份加以補充，而完成了的。近衛稱他這些「手記」是「自己政治的真實告白」，而且說：「這種記錄是我的政治的遺書」，他自稱：「這記錄，將成為敗戰的日本之政治史，把過去以及現在一切奇奇怪怪的日本政治真象，暴露給日本國民。」

聽說有人懷疑這些記錄的真實性，我想這個問題容易解決，因為真的總是真

的，假的變不了真的。一個人談及自己的過往，尤其當向世間表白自己責任時，自然難免有替自己矯情辯解的地方，讀者對於這些，不但一看就可以明白，而且是應當含笑予以原宥的。所以說這些記錄是和美國陶德大使的「使德日記」，美國漢德森大使的使「德辱命記」，以及義國齊亞諾外長的「外交日記」，同樣有參考價值，並不過份而嫌不足。

我們過去對於近衛總有一個懦弱無能花花公子的印象，看過這些「手記」之後，我們不能不承認對於他的觀感是錯誤了。他是一個政治家，是一個在極端不利環境中的失敗的政治家。他有見解，有抱負，但是沒有貫徹的執行力。

雖然這「手記」中所記錄的許多事件已成過去，但對於我們不僅有參考價值，而且也會有教訓的意義。日本過去是我們的死敵，今日也還是一個我們最危險的鄰居，我們不能瞠目望着它的現在，恐懼想着它的未來，而忘記了追遡它的過往。

本書所以題名「日本政界二十年」，是因為從其記錄的時間來看，差不多將近二十年，而從日本法西斯政治之醞釀以及當權的歷史來看，那也是足足的有二十年了。二十年的軍人政治，可以使一個現代新興的國家瀕於滅亡，僅只這點，也是夠我們警惕的了。

編者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，

目次

譯序

一 第一次近衛內閣與中日戰爭

二 第二次近衛內閣與三國同盟

三 從阿部內閣到米內內閣

四 從平沼內閣到阿部內閣

五 關於日美和平談判

六 大東亞戰爭失敗前

七 備忘錄

一八一

一 軍部之矛盾與軍政衝突

一九三一年「滿洲事變」之前十年中，是所謂政黨內閣時代。自事變之後，軍部勢力始急遽抬頭。翌年（一九三二）「五·一五事件」之後，傳聞陛下將召西園寺公有所垂詢，余遂於公未晉京之前，先往興津拜訪，陳述個人對今後政治之意見。大意爲：過去十年間業已確立之政黨內閣，已爲軍部之叛變所葬送，對此有多加考慮之必要。因此余建議兩事：

第一，犬養毅首相雖被殺害，其後繼首相仍應出自政友會，以堅持政黨內閣之傳統。即使因此再與軍部衝突，亦應澈底保衛政黨政治及議會政治。

第二，爲極冒險之一途，即相反的率性使軍部負責，若軍部能負全面責任，則太上政府與惡棍干政之弊，自可於此終止。同時，軍部本身於其執政中，必然同歸失敗，則軍人之政治地位亦可藉此予以清算。

余進言此兩途中任擇其一，然西園寺公對此未作表示，即行晉京。甚至難於出面之東鄉元帥亦曾喚余往談，但余之提案，終未被採納，乃出現既非政黨出身亦非軍人出身之中間性齋藤內閣。（齋藤內閣首相齋藤實，爲「五・一五」政變後之第一任內閣——譯者）

軍部不問其政治發言權是否合法，而極力欲獲得此項權利，在如此狀況下，西園寺公之主義雖爲竭力希圖組成政黨內閣，然當時之政黨，一方面徒然招致軍人之不滿，同時國民對之信賴亦甚微，若以國民無信賴之政黨組閣，其與軍部之磨擦，必愈形激烈。反之，若使軍部負責政治，難免走向過激之途，漫無止境，故以中間內閣最爲妥當。若謂此中性內閣將有何作爲？概言之，雖終不免要受軍部之控制，但對軍部亦可加以約束，此種約束至環境迫不得已時，再對軍部讓步。而所謂讓步實際則是故意拖延，並儘量使因讓步所產生之種種危險，亦止於最小限度，此即中間內閣之最大使命。以上爲西園寺公對余所言。

元老對軍部之方針，及其所組成之中間內閣，余雖不能贊同，然事實上軍部勢力已日漸成長，尤以在「二·二六事件」之混亂紛擾中，陸軍大臣現役制得以復活，軍人之政治發言權，因之更形強大。

陸軍大臣現役制係自明治時代相傳而來，至一九二三年山本權兵衛內閣，始擴張至豫備役，此為非軍人者出任大臣之第一聲，作為民主主義之一種傾向，應表歡迎。事實上雖未出現豫備役之陸軍大臣，但此種制度實則極足珍視，以其對軍部足以形成一最大之壓力也。「二·二六事件」對軍部之重大的政治意義，亦即此陸軍大臣現役制之復活。要之，軍部利用此種制度，已完全掌有制內閣死命之大權。加之，陸軍大臣既非現役軍人莫屬，今後之奏請，則非現役三長官所推薦之人物不可。（三長官係陸軍大臣，教育總監，參謀總長。——譯者註）

如此情勢下，西園寺公所決定之對軍部方針，遂成為政治大道，自齋藤內閣以至美日開戰時止，其間歷代內閣之所以均為中間性之存在者，乃全係根據此方

針而來。例如齋藤內閣時代曾退出國際聯盟，此固非陛下之真意，亦非齋藤首相之個人心裁，全爲處於軍部壓迫下之讓步，正與余任內之締結三國同盟條約如出一轍。因之，當論及「五・一五事件」以來歷代內閣之功罪時，實有將對軍部之讓步，及由讓步所產生之種種危險如何抑止於最小限度諸事，必須予以體會。

近代日本陸軍之人事機構，爲極端封建性與地方性之結合。號稱長州陸軍或陸軍長州之長州閥，以山縣元帥爲首，經桂（太郎）寺內（正毅）兩政權，以至田中義一大將，雖保持長久之勢力，但由於反長州閥——以上原元帥爲首之薩摩、佐賀、土佐諸閥之抬頭，我國陸軍派系之鬥爭遂即展開。長州閥對反對派最明目張胆之壓制，即清浦（奎吾）內閣時，原已決定由上原元帥推薦之福田雅太郎爲陸軍大臣，但田中義一擠進組閣本部，辭去福田，任用雖非長州出身，而係田中一派之宇垣（一成）大將爲大臣。自此，陸軍要職，遂全爲長州閥所盤踞。然當長州閥苦於人材不濟時，以南（次郎）大將、金谷範三等爲中心之大

分閥，與長州攜手，遂兩崛起，因此形成大分閥與薩摩、佐賀、土佐、諸閥之對立。

「五・一五事件」以來，以薩摩系荒木（貞夫）大將爲中心，佐賀系眞崎大將、武藤元帥，土佐系小畑敏四郎中將、柳川中將等所謂反長州閥人物得勢，於是武藤元帥出任關東軍司令官，眞崎任參謀次長，小畑、柳川亦均於參謀本部位居顯要，然因「二・二六事件」之肅軍，彼等全部垮台，天下再度成爲長州、大分系統之陸軍，直至今日，彼等依然支配陸軍，並直接干涉本國政治。

當陸軍干政愈演愈烈時，較之派系之爭，思想的分野當更爲重要，已如前述。薩摩、佐賀、土佐等閥，稱爲「皇道派」，長州大分系，稱爲「統制派」。「皇道派」中，如荒木大將小畑中將等人，當蘇聯革命時正任武官駐在帝俄，彼等對蘇聯之動向，尤其對共產主義之活動，特別關心，故其思想，在積極警戒日本之赤化。彼等除對內標榜「防止赤化，維護國體」，以振興日本主義、日本精

神爲中心外，對外則一意對蘇。他如對進兵中國或南進等，均表積極反對之意。此派固然反對「滿洲事變」、「中國事變」，即對進兵安南，亦絕對反對。此兩派對國內問題之意見雖不得知，然以言對外，則皇道派與統制派完全相左，互不相容。因「二·二六事件」之株連，皇道派全部垮台，應視作引起「中國事變」以及此次大戰日本轉變外交政策途經之契機。

當日本精神及日本主義氾濫於朝野之際，一般人均爲之蹙眉不已，咸認以荒木、真崎兩大將爲中心之「皇道派」，確係誤國誤軍之徒，應澈底清除實爲肅軍之要旨，於是「二·二六事件」後，以此博得極大之喝采。然而陸軍之動向，寧可謂因「二·二六事件」，得以強化其國內政治發言權，由此所謂中國派（侵華派），南方派（南進派），將對蘇派之皇道派一掃而光，隨心所欲，引導國家步入於其所希望之途矣。

如上所述，軍部於「二·二六事件」因恢復陸軍大臣現役制，於政治上完成

一大進展，所謂「對英美自重派」、「對華自重派」之皇道派，全體被清除，陸軍今後動向實有令人不寒而慄之感。因之，余初次奉命組閣之際，遂以無自信告陳西園寺公，並以體病爲由，辭謝大命。當時西園寺公認爲對內對外最危險之皇道派既已清除，肅軍可謂已告成功，故對余之意見頗表不滿。惟將其後之中日事變以至此次世界大戰間諸動態，加以對照，雖時至今日，余仍相信當時之觀察並無錯誤。

二 第一次組閣與中日事變

一九三七年六月，再度拜奉大命組閣，余已不再懇辭，立即着手組閣工作。余之組閣方針，雖已明言標榜「國內社會正義，外交國際正義」，但縱觀廣田（弘毅）與林（銑十郎）兩任內閣，已十分瞭然，陸軍干政唯有日趨擴大之一途。故此際之外交政策，若不合乎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，則日本於世界上之地

位，將更遭逢重大問題，已可預卜，尤其對華對英美之政策，更需以慎重爲宗旨。無奈陸軍中皇道派已被清除，若欲勉強起用，又有陸軍大臣現役制度之嚴重限制，不易措施，僅能向陸軍披露余之信念而已。因而，本爲同一內閣開員之陸軍大臣，竟至完全超內閣而存在，且須將陸軍部意見作爲國策發表，實已操縱內閣之生死。況陸軍部意見，究由何處產生，余亦不得而知，實則內閣已成爲無影無蹤之統帥權下的傀儡。

余拜命組閣之時，陸軍自「滿洲事變」以來所爲之諸種策動，已相繼成熟，在中國大陸似有一觸即發之勢；當時中國問題，已至非武力解決不可之程度，余當然不知，故組閣後不足一月，蘆溝橋事件爆發，竟至擴大爲「中國事變」。當時各種事件之發生，政府中人固無所聞，即陸軍省亦無所知，完全出自當地軍人之策動。

現在一談中日問題及「中國事變」之事。無需申述，所謂中日問題，只限於

余個人所交涉之部份，並非對整個事體而言。

一九三一年余嬰病，翌年一月始遷往鎌倉，專事靜養。至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，借住三菱之別墅，而是年夏鎌倉自建別墅落成，乃即遷入。正當此時，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氏以患血壓高病症，亦遷居於長谷之大佛境內修養。某日——憶似爲「五·一五事件」之後——蔣公使攜其祕書丁紹忉氏來訪。丁氏係余第一高等學校時代之同學，料蔣氏之所以攜丁氏同來，或即由於此種因緣。自是而後，蔣丁兩氏時來見訪於鎌倉山余之家中，約每月必會晤一次。

蔣公使曾任駐德大使，爲蔣主席親信人物。渠以丁氏爲通譯，嘗論述中日問題，而警告余曰：「中日關係倘常此以往，其衝突非僅不可避免，且有發展爲世界大戰之可能性。」渠首先述及蔣主席之實力謂：「蔣主席爲中國之中心人物，時至今日且有統一全中國之勢。因之，認識中國應先認識蔣主席之實力。今日確認蔣主席爲中國之中心勢力，爲日本改變對華外交政策之最佳時機。中國雖尚有